

# 营造党内不同意见 平等讨论的环境

□刘建武

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 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的要求。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是全体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职业异同、资历深浅 都处于平等地位，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在党内生活中，每个党员都享有自由、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包括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要把党章赋予党员的民主权利，诸如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对党的决策的讨论权、表决权 对党的工作的建议权、倡议权，对党的干部的批评权、评议权、监督权和罢免权 以及申诉权、辩护权和意见保留权等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只有在自由地发表看法、平等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广大党员才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党的工作和党内事务中来，正确行使党员的民主权利，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失误，保证党内各种机制的有效运行。没有党内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充分行使和可靠保障，就谈不上真正的党内民主。

要坚持和贯彻好民主集中制，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允许党员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 就党的重大问题和决策发表意见。只有营造一个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才能促使广大党员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开展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和坦诚交流 才能不断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保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宽松的环境，广大党员不能充分发挥参与和管理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就会造成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局面 党的决策难免不发生失误。

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健康正常，不同意见能够平等讨论和坦诚交流，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 蒸蒸日上 反之，什么时候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和迫害 党内民主就必然受到破坏 党的事业就必然遭受损失。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要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和制度，使那些讲真话、讲心里话的党员受到鼓励和保护。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 “节约型社会”首要在“节官”

□章立凡

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国策，主张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当今中国，冗员才是最大的浪费。试想若官员只有如今的半数，则各级政府大楼或可少盖一半，地皮、建材、人工、能源、日常维护费用等就一概节约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件大好事，但不应仅限于节约经济资源，理当标本兼治。将空调设定于摄氏 27 度，是可节约不少能源，但究属治标，治本之策，还须从节约社会成本做起。否则你辛辛苦

苦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他那里大笔一挥圈地起楼——节约还是赶不上浪费。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1941 年 11 月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的议案有不善的动机。交付表决时，李先生发言刚毕，毛泽东就站起来，边鼓掌边走到台前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精

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必须靠制度来保障，必须落实到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程序化上来。与其他因素相比，制度和机制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现在的任务除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规章制度真正贯彻到实践中去。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去执行，也会形同虚设。许多规章制度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行不力。要通

过抓制度的落实，使那些敢于讲真话、讲心里话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受到应有鼓励和保护，使那些利用职权对有不同意见的党员挟嫌报复、打击陷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及处理。只要把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法规制度落到实处，就能够改变“谁讲真话谁吃亏”、“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不正常现象，就能够形成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和谐环境。

（摘自《求是》杂志）

兵简政'的议案终获通过。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他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二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被他严格控制，搞得不少单位啧有怨言。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很快就被突破了。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二万人增加到八万人。实际上现在是七万七千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八万七千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二万增加到八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周恩来经济文选》——《要精简编制》）

对治理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八万七千人的中央政府编制定额算不上一个大数字，但周恩来用了“大堤溃决”四个字来形容。其后五十年间，干部人数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官僚体制如同顽固癌细胞，本能地无限自我克隆，你从这边宣布裁撤，他在那边“翻牌”重出江湖。党和政府家大业大，虽历经多次精简和邓小平时代的百万大裁军，“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仍停留纸上。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

会议上摆出了一个数字——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1名官员！他说：1979年，我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2万人。当今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其比重攀升之快，实在令人堪忧！”

我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官口膨胀”却未见有相应的铁腕来钳制。目前社会资源的浪费远不止于官民比例的失调，因官员而付出的各种社会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高于当今的发达国家。

自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迄今，历史已翻过六十四年，中外政治舞台白云苍狗，社会变迁历历在目。从国民党腐败丢失江山，到中共转轨改革开放，从“苏东波”一夜变天到“颜色革命”，“骨牌效应”……诸多教条皆已失灵，惟“精兵简政”仍是政治家的金科玉律。

“干部有病，群众吃药”不合节约原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国策能否奏效，要看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身体力行——首先把社会管理成本降下来。

（摘自《社会科学报》）

# 社团组织是衡量一个国家 和谐程度的重要标志

□辛向阳

现在全球有大大小小 4 万多个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不断协调着各种事务，避免各种矛盾加剧。美国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在其《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对此做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在国际体系关于合作与规制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其中绝大多数对其成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常规性管制。在 1909 年全世界共有 37 个政府间协定组织（IGO）和 76 个非政府组织（NGO）；1951 年相应数字分别为 123 个和 832 个；1986 年分别达到 337 个和 2649 个。另一个显示国际组织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数字是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与国家或国际组织签订 623 个条约的缔约方是国际组织；在二战后的第二个十年间达到 1051 个，在第三个十年间达到 2303 个。”

在这样一个逐步组织化和机制化的时代，各国完全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相互之间产生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无须诉诸武力。

解决国际问题的途径正在向组织化和机制化转变，同样，解决国内的矛盾和问题也需要组织化和机制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就在于建

设一个组织化的、体系化的社会。我们现在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就在于在改革的过程中把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后，“社会人”失去了组织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把人从“社会人”变成“社会化的人”。

所谓“社会化”就是要把公民组织起来，使之在各种组织的框架内活动和提出自己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在这三种组织中，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成熟的社团组织及运行体制，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处于有序和谐的状态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有没有足够的手段和途径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其不致达到激化和对抗的程度。如果缺乏这种化解途径，问题越积越多，摩擦愈演愈烈，矛盾激

# “与国际接轨”和“洋葱头型” 社会结构

□邵道生

大学学费涨价的问题，有的专家在文中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目前美国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每年是 4694 美元，而中国则为 4500 - 7000 元，意思是说我们国家每人每年的 5000 元大学收费不仅不高，甚至还有上涨的空间……所以，“与国际接轨”是一些经济学家们“拿得出来”的最响亮的根据。

而且不仅仅是大学学费，每当

物价要往上“调整”时，“与国际接轨”也是“专家”们常拿出来的理由。

物价问题能不能与国际接轨？要不要与国际接轨？可不可以与国际接轨？我想“回答”能不能“要不要”“可不可以”等问题要满足以下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国民的平均收入，二是国民的贫富差距。

美国的国民人均收入是 3 万多美元，每人每年 5000 美元的大学学费仅占年人均收入的 1/6。我国的

---

化必然引起较强烈的社会震荡。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可以充当安全阀的作用。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萍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市民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早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国际上，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谐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高

低的尺度。西方福利国家改革时期也是社团组织大发展的阶段，如法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每年只有 11000 个组织成立，而到 1990 年有 60000 多个民间社团成立。德国每 10 万人口的社团数量从 1960 年的 160 个增加到 1990 年的 475 个，增加了近 2 倍；瑞典公民的社会参与率世界最高，创建了一个每 10 万人口就有 2300 个社团的稠密的社会网络。

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 NGO 组织，把公民组织起来，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的路径。（摘自《中国青年报》）

人均 GDP 是 8000 元人民币左右 以大学学费平均 5000 元来计算 它占 年人均 GDP 的 5/8。从真正意义上的 ‘与国际接轨’ 来看 中国大学学费的价格应该为 1300 元左右，所以，中国的一些专家的脑子肯定是 “犯糊涂” 了 连最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算了。为什么？只有一点：忘掉了中国的国情。

而且 我国的人均 GDP 现在是 8000 元这个数字，对大多数国民来说亦是 “虚假的”。为什么 因为中国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实在太 大，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从中国国民贫富差距结构来看，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不是 ‘富少穷少中间多的 ‘橄榄型’ 而是 ‘富少穷多的 ‘洋葱头型’”。在这个 “洋葱头型” 中处于 “底部” 的是原来的 ‘主人翁’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还有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是他们变成了 ‘洋葱头形态’ 的 ‘底部’ 所以 对这三类处于底部的阶层来说 这 8000 元就是一个 “天文数字”。供养一个大学生 需要一个城镇居民 4.2 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 13 年的纯收入 如果是贫困县的家庭 则需要一个农民 35 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以及假期回家探亲等费用呢！

所以 若是硬要让这些处于 ‘洋葱头形态’ 的 ‘底部结构’ 的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和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们与 ‘国

际接轨” 那就是变相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权。

所以，对那些高喊 “与国际接轨” 的专家来说 简直就是一些无视国家国情的 ‘睁眼瞎’！在物价问题上我主张 ‘要少用、慎用’ 与国际接轨” 之类的不符合当今国情的口号，更不能让它来误导社会。

所以 对当今飞涨、疯涨的 大学学费、房价、药价之类的关于基本民生的问题 不仅不能 ‘与国际接轨’，而且要用 ‘铁的手腕’ 将它们的价格压下去，这才是保持社会真正稳定的 ‘灵丹妙药’！

什么叫 “执政为民”？什么叫 “群众利益无小事” 什么叫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想 作为各级执政者来说 都应该重视 ‘洋葱头形态’ 底部的 ‘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和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们的实际存在情况及其利益了，而不是千方百计地将本地区、本部门的价格匆匆忙忙地去 ‘与国际接轨’。

（摘自《杂文报》）

---

## 今日说法

“怀才就像怀孕 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某知名少年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说。

“你永远不能休息 否则你就永远休息。”

北京 CDB 白领感言。

# 中国外交三大难题

□秦 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外交目前主要有三大难题，但同时也有三大盾牌。

他解释中国外交目前主要有三大难题：一是台湾问题。中国是大国中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二是中国选择的政治道路是独特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愿信任这种选择。三是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可能是国际关系最复杂的地区 大国小国、各国宗教力量等集中于此。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挑战。

此外，经济因素也使中国外交受到挑战。在一些国家看来，中国迅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对世界经济形成了一定的压力。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中 大约有 300 多项起诉在等着中国 其中来自拉美的最多。

金教授强调 目前 中国外交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如中日关系麻烦不断，美国出现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另外还存在朝鲜半岛核问题、联合国改革等；但这些问题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这位学者认为，中国外部和内部的“两大阶段”对中国外交造成

了根本性的挑战。

其一，就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来讲，中国正处于一个“将起未起”的阶段。如果中国完全没有崛起的势头，其他国家就不会注意中国，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自然要少很多 而如果中国已经彻底崛起 国际社会肯定会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将起未起”造成的结果是 中国力量的增长引起了其他国家的重视，但还没有被接受。

其二 就国内发展而言 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外国习惯上把中国叫做“转型期社会”或“转型期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明朗。国家利益是外交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但是国家利益总在发生变化。中国进行的现代化不是要自己永远成为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在外交上给自己的定位是“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金教授说，三大因素成为中国外交的有力后盾：一、军事上的核力量 二、政治上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三、经济上市场规模庞大。这三大因素直接支撑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摘自《青年参考》）

# 美国对华外交的宗教情结

□于彦智

依据“反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一规律，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始终被美国看作威胁基督教文明体系构建的敌对势力。

美国人的对华外交，遵循着基督新教的理念。

基督教是一个具有强烈传统热忱和救世主义态度的宗教。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应该来传教的地方。上帝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一个金币，你要给我还一百个金币回来。让数亿人民归属上帝，在基督徒看来，相当于给了上帝数目极为可观的金币。

传统的中国，是个世俗主义和搞偶像崇拜的国家，因此，美国人把中国当作亟需救赎的异教徒之地，对传播福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从传教的热忱到对反基督教者的仇视，再到异教徒情结

在清朝，美国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传教士，建立了众多的教会学校，花费了大量人力及资金。截至清朝末期，来华的传教士中60%为美国人，教会学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在政治上，对华的态度也较友好。在列强纷纷

宰割中国的时候，美国基于基督教精神，对列强强调了对华交往的公义性。李鸿章对此深有体会，李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事实也如李鸿章所说，当英法日等国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的时候，美国人拿它在中国建立了清华北大等教会学校。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比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国民党军政首脑蒋介石、基督将军冯玉祥等等，都是有势力有影响甚至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基督教徒，并且在他们周围也聚集了一批因信基督教而入围的幕僚。美国对中国关系这时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与此同时，日本尊天皇为“现世神”，大搞天皇崇拜、军事独裁，建立起一套反基督、反基督教文明的国

家体系，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敌对国家、邪恶帝国。援助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日本，成为美国的亚洲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后 经过四年内战 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 主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朝鲜战争期间，在信奉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当中，竟然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在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 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百姓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

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为了对付美国当时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他是一位并不信奉基督教而更注重地缘及利害外交的梅特涅派外交信徒，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的务实外交并未表示放弃意识形态，使得美国人将中国看作类似传统中国时期的异教徒之地，影响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入宣讲个人主义，告诉中国个人主

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

苏联及东欧事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 但此时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以及更加务实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于是美国又把敌对中国的策略变成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价值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WTO的加盟，是这一时期的反映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由于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在福音派眼中，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迫害宗教自由、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同情伊斯兰的准敌对势力，是有可能成为反基督势力领袖的潜在的敌人，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  
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利益论有一句名言是：外交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用利益论来解释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

但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

形态性外交。占国民 80% 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就使得美国在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在异教徒面前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执行的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有着基督教的传教热情和救世主义态度，他们的区别仅仅是方法和策略上的区别 所以 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希特勒及纳粹、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

基督新教信徒与恪守唯物论的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

当然，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苏联封锁和对抗。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依据“反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一规律，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被美国看作威胁基督教文明体系构建的敌对势力。尽管美国可以依据“智慧的外交原则”出于利用中国的目的而表面将中国称为朋友或战略性伙伴关系，如利用中国配合其反恐战争、利用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等等；但一旦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成为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主要障碍。美国作家 Richard Bernstein 与 Ross Munro 合作写的一部叫做《不久将与中国斗》（《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的畅销书 对未来有可能与中国发生的矛盾冲突与斗争描绘得很清楚。

（摘自《看世界》）

# 中日困境对双方都不利

□刘江永

中日关系已经开始走向‘政冷经也冷’；  
走出这个困境 要认识一个关键问题 打开一个死结 防止摩擦 开展对话。

## 小议‘政冷经热’

“政冷经热”是近年来中日关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它反映了中日之间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逆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7年笔者曾撰文指出：“中日关系出现这种‘经热政冷’现象构成了1995年以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这一阶段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关键是日本政界领袖能否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十年后的今天，世界迎来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 然而 由于同样的原因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更为明显。2004年中日经贸总额增长了25%以上，而中日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

2005年中日关系的趋势之一是‘政冷’可能影响‘经热’。这主要是由于小泉首相至今未明确表态任内不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中日高层互访仍难成行；日本右翼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再度经

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而一批支持右翼教科书的日本企业、团体的名单曝光则激起中国一些民众起来‘抵制日货’针对中国涉日游行中部分人的过激行为，日本当局要求中方道歉、赔偿，日本国内可能出现反华浪潮；在中日两国民众对立情绪上升的情况下，日本部分企业来华直接投资的信心受到打击。如果局势得不到有效控制，今年下半年可能出现日本对华出口下降、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情况，其程度将取决于中日‘政冷’的程度。如果小泉8.15参拜靖国神社或日本在钓鱼岛及东海油气开采问题上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中日关系便可能出现‘政冷经也冷’的情况。

## “政冷经也冷”对谁更不利

中日关系‘政冷经也冷’意味着两国关系全面恶化，这对中日双方都不利。中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利益和全局就是维护稳定和谐的国内环境与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精力发展自己。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和重要经

贸易伙伴，日本的先进科技可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中日间出现“政冷经也冷”显然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政冷经也冷”局面对日本更不利。日本将在政治、外交、经济三方面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日本内政处于“内争”状态，即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改革遭到全体在野党和执政党内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外交陷入“外焦”状态，即在东北亚处于战后以来最孤立而窘迫的焦虑之中，经济面临“经急”状态，即刚刚略有起色的日本经济受到“高油价”、“高日元”的巨大压力，日本企业急切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在明年9月小泉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前，如果小泉内阁不能改弦更张，日本的“内争”、“外焦”、“经急”必将全面加剧。

外交上，日本要员继续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必将使日本在亚洲进一步孤立。日本不仅会失去战后60周年的所有外交机遇，而且今后要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将难上加难。今年以来，由于日本同邻邦关系全面紧张，导致人们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关心程度的下降和具体操作的困难。整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震荡，而震源就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膨胀。

经贸领域，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已开始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质变。2004年是这种变化的转折之年。这表现为日本丧失了11年来中国

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退居第三位。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从1985年最高时的30.4%降至2004年的14.5%。与此同时，日中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3.5%上升到2004年的16.5%。2000至2003年，日本外贸增长了7%，而中日贸易增长了50%。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日中贸易的增加对日本恢复景气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去年日本对华出超达200多亿美元，中国若减少从日本进口或许有利于实现双边贸易平衡，而对日方来说则将意味着一些企业破产。在资金合作方面，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大幅下降。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92亿美元，而韩国则高达139亿美元。当年度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数额还不到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零头。很显然，日本正因为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而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不断输给欧美和韩国，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则持续快速发展，并未受到来自日方的多少影响。

## 如何走出困境

行胜于言。目前，中日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已不是口头表态就能恢复和建立的。日本政府在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上的实际行动是两国能否建立良好政治关系的重要标志。

首先 中日能否恢复高层互访，小泉首相能否做到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是关键。1986年9月3日，当时的中曾根康弘首相曾表示：“所谓甲级战犯的合祀问题，从对方国家来看，总理大臣正式参拜祭祀有对本国遭受侵略的大规模战争负有责任的领导人的场所，等于表扬这些人，刺激国民感情。我们是亚洲国家 所以还是要对大战反省 接受教训。这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宿命。”从那时起 日本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不前往参拜靖国神社已成惯例。前首相中曾根能做到这一点，小泉首相难道不应同样做到吗？

其次，日本右翼教科书已经成为可能导致中日关系“政冷经也冷”的死结，日方须妥善处理。如果右翼教科书编撰会继续得到日本一些企业的支持，就等于在做“反面广告”将损害这些企业的形象和产品销路，也使日本政府每四年都会因为审定右翼教科书而同亚洲邻国发生一次政治摩擦。要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只能继续按1982年铃木善幸内阁的表态做。当时日本政府表示：“日韩联合公报、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我国的教育、教科书审定中当然也应该受到尊重，但今天，我国教科书的记述受到来自韩国、中国等的批评。作为我国 要在推进与亚洲近邻各国友好、亲善的基础上充分倾听这些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同年11月 日本社会科学教科书审定基准增加一项规定：

“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这就是所谓“近邻诸国条款”但有了条款 还要看日本政府能否践诺。

第三，中国对日本要坚持友好合作的方针 防止两国摩擦扩大化。尽管小泉内阁对华政府消极面在增大，但目前日本并未与中国全面为敌。中日在经贸、能源领域 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巨大可能性，中国民众盲目抵制日货不可取。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仍表示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中日之间既有摩擦也有通过抑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的共同利益。在安全方面，中日既有矛盾也有在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必要。在民间交往方面，越是在中日政治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中日越应该加强各种民间交往与合作。在传媒和舆论方面，除了全面客观的报道外，要特别重视对互联网的引导，尽量避免极端民族主义通过网络扩大影响。

第四，中日双方应尽早就东海油气开采及钓鱼岛问题展开对话，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这个问题必须从经济全球化、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化的历史潮流来认识和寻找出路。把国家利益绝对化、片面化 企图以军事力量维护和扩大本国权益的做法有违时代潮

# “莫逼专家都做官”

□杨黎洪

学优则仕 曾为传统。如今 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安排有学问的人成为政治精英，也自有其合理有效的一面。在最近 20 年来的改革中，一批批学术人才纷纷走上管理岗位 学者型、专家型领导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在政坛上，对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民主化推进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而且 随着全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各地引进高学历人才、高级知识分子的力度还在不断加大。去年，国内有几个城市的政府部门甚至出台政策规定：取得博士学位可直接被任命为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此可谓为“学优则仕”的现代版。

但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学而优者 大家都往官道上挤 客观上耽误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人才有别，学有专攻，绝不是所有教授、学者都可以从政做官的。一个

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不一定能当好文化局长，一个建筑学教授也不一定当建设厅长。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优秀的学者担负领导工作后无法称职 既荒废了专业 又没有政绩，导致人才的最大浪费。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 有些代表呼吁：“莫逼专家都做官”。这话颇为有理。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第一，建立与现代社会多元结构相适应的人才评价与使用机制。学而优，意味着具备某种能力和专长，可为仕，可从商，可治学 可悠游天下 多元化的社会应该能够给每个人提供可以选择的适合空间和值得选择的理由。第二，以职位与能力的匹配原则严格选拔官员。人才使用，最佳境界是合适的职位用合适的人，如果恰好又是学而优，善哉善哉。

（摘自《羊城晚报》）

流。实际上，随着中日两国相互直接投资的增加，两国资源能源的获取与安全保障的共同利益将越来越多。东海油气资源的开发与供应将使在上海地区投资的日本企业直接获益。从长远看，中日两国不仅是近邻 而且可能成为“经济共同体”，因此，双方应迅速展开具有建设性

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协商与谈判，谋求相关问题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争取实现共同调查、共同勘探、共同开发、共同获益。当前尤其要防止单方面行动不断升级，导致局部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公开的对抗 甚至损害中日关系大局。

（摘自《世界知识》）

# 解读经济增长的中国“谜团”

□周雪飞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 尽管比去年同期低了0.2个百分点 但与今年一季度相比 还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

作为国民经济运行核心数据的经济增速，似乎把中国经济定格在“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状态 然而喜人的数字背后 隐含着巨大的反差和诸多迷惑待解。

## 增长的悖论

就宏观经济而言 中国保持了积极向好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转型国家中 这种近乎“奇迹”的经济增长绩效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而从微观主体来看，当前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却节节攀升，经济效率不断下滑。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95万家各种类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8.5，分别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下降7.4点和3.0点。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信息则表明，上半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9.1% 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5个百分点 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59.3% 升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8个百分点 创下1999年以

来的最高水平。

7月中旬，银监会官员提出警示，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库存大量增加，效率普遍下滑，资金日趋紧张，因此银行业应当注意防范新出现的风险。人民银行8月4日发布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资源、能源约束的矛盾突出等老问题，同时还出现了部分行业利润下降、进口放缓、贸易摩擦升级等新问题。

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 宏观层面上 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显然社会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当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反映在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比例和呆坏账上，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 结论显得匪夷所思 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无效率或效率很低的一个。

尽管2004年底 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指标完成了，但因为商业银行对于当年或短期不良贷款的下降拥有很大的操作余地，所以实际形

势并不乐观而截至 2004 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 12.6 万亿元 约占 18.9 万亿银行贷款的 66.7%。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 国有企业欠银行 (主要是国有银行) 银行欠存款人 (主要是居民储户)。大量不良贷款的堆积致使银行机构最终被迫“惜贷”。

毋庸置疑,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已经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中 尽管经济呈现较快增长, 受益人却并不是那么多; 而假如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 整个社会又会身受经济停滞之害。这样的囚徒困境, 不仅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 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政府的政策主张,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走向。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 0.458, 超过国际公认的 0.4 警戒线。国家统计局也披露 内地最富裕的 10% 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 45% 而最贫穷的 10% 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 1.4%。

耐人寻味的是, 1998 ~ 2002 年间我国 GDP 平均增长 7.3% 而 2003 年猛增到 9.3%, 2004 年达到 9.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反弹得这么快 失业率应该下降才对, 但事实上, 2000 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节节攀升, 而农村还有 1.5 亿富余劳动力等待消化。

应当说, 增长与发展远不是同

一层面的问题。如果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代价, 那么这种增长将因严重失衡而不具有可持续性。

## 增长的动力源何在

围绕当前和今后经济增速放缓与否的争论 归根结底 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究竟应当放在哪里的问题。

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是: 内向经济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来拉动, 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本国资源和环境质量, 而且与诸多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加大 时至今日已经难以为继。

不可否认的是, 投资依旧成为本轮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引擎, 2004 年固定资产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超过 50% 然而, 令人堪忧的是, 中国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从根本上说 自 2003 年我国经济增速重上 9% 之后, 资源已显得高度紧张。可以肯定地讲, 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将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学者指出: 中国过去几十年间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这种模式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该发挥的基本上全发挥了。如果经济增长模式今后仍未实现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慢便不可避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对金融信贷的增长具有高度依赖性。改革之初的 1978 年，银行贷款余额只有 1850 亿元，27 年后的 2005 年 6 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 19.9 万亿元，年均增幅近 20%。信贷的快速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而这又有赖于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吸收包括居民储蓄在内的存款资金，进而形成可贷资金才得以实现。

居民储蓄不断增长、国民储蓄率持续提高，促使投资增长速度和总投资率得以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转型之时，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举足轻重”。1978~2004 年间，我国投资率平均为 35% 左右。这样的投资率不仅高于一般国家的水平，也高于与中国有着类似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储蓄倾向较高的东亚国家。

与投资率相对过高形成反差的是，最终消费率从长期来看存在持续下降趋势。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在 79% 左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最终消费率在 60% 左右，而我国 1990~2001 年间平均消费率不足 60%，消费与投资增长极不协调。2000 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2004 年我国投资率上升至 43.9%，最终消费率则下降为 53.6%。

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最终失去消费需求的支持，导致生产能力闲置，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引发企业效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长此以往，高储蓄支持的经济高速增长极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即高储蓄率使消费不振、市场疲软，企业受影响投资减速、生产下降，这就造成失业增加、居民未来收入预期不好，于是人们控制消费而选择高储蓄。

究竟应当从何入手拉动内需？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现时期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似乎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致使公共产品严重短缺。近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在改革中过度市场化、产业化，导致公共支出重心转向个人，民众不得不背负起改革的代价，并被迫成为公共产品的“自供者”，进而锁定、冻结了大量居民储蓄。在政府职能不到位、社保体系不完善、财富增长不平衡的情况下，想要刺激全民消费是很困难的。

于是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引擎，2004 年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约为 6%；2005 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总值占 GDP 的 70%，其中出口达到 40% 以上。然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现在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为 0.9 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富人